

“非洲发展趋势与中非关系前景 高端研讨会”综述

赵 俊^①

2011年4月2—3日,在北非局势发生持续动荡与战乱背景下,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非洲发展趋势与中非关系前景高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外交部、教育部、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共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聚集非洲发展趋势与中非关系前景。

开幕式由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王克、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吴锋民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许多知名学者、非洲问题研究专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主要围绕“全球体系变革与中国外交总体背景下的中非关系”、“北非国家政治动荡的起因与性质”、“北非变局对地区与全球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处理非阿西关系的思想框架与话语建构”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全球体系变革与中国外交总体背景下的中非关系

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变革。此次北

^① 赵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非、西亚局势动荡给这种变革又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给中国外交尤其是中非关系带来新的影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院院长刘贵今大使认为，新千年开始，中非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都有全面的发展。但与此同时，非洲自身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洲国家对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认知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非外交传统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与分歧。非盟与阿盟在科特迪瓦动乱、利比亚战争问题上改变了过去从没有通过一个决议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它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做法。非洲地区组织几乎是全盘接受了保护的责任和人道主义干预原则，现在挑头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制裁。中国过去在确定对非洲政策尤其是在战乱问题上的做法就是跟着非洲地区组织的态度走，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政策应如何调适，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关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教授认为：第一，此次西亚、北非动荡是 1952 年纳赛尔革命以来最为深刻的一场运动，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会产生影响；第二，青年一代提出民主、机会均等以及伊斯兰理念对南北对话中的一些理念形成了大碰撞；第三，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行为发生了新的变化；第四，国际体系现在正面临着—个重组的关键时期。鉴于上述判断，中国在中东、北非政策上要实现从单向到综合、从适度超脱到适度参与、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承到今后与时俱进地调适政策过渡。因此，我们对不结盟、不制裁、不干涉内政等外交路线需要作新的考量。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认为，未来一两百年是全球体系新的重大调整期，非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崛起，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地位相对下降，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随着非西方世界整体性的崛起，阿拉伯世界有可能走出千年来与西方的苦涩共生，有可能摆脱西方对它的总体牵制。就中国而言，非洲这盘棋走好了，未来 20 年中国就能实现全球身份真正的、历史性的转型。在这样一个全球变局上面，中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跨越近代以来西方所设计的现代性的话语体系，跨越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墙。如果不能跨越这个高墙，构建非西方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思想体系，将会长期制约亚非国家的发展进程。亚非国家目前的思想准备，知识积累以及理论工具的创造是远远不够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国家大致分

成四类：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和欧洲；第二类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那就是离岸经济国家，中国就是离岸经济国家；第三类是由于IT行业产生的，印度是最典型代表；第四类是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毕竟中国发展起来了，也有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最近温总理说不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只适合处理中国的问题。美国人说华盛顿共识是有世界性意义的，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意义的还是具有世界性意义，这是需要学术界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我们很难处理好中非关系。

外交部亚非司参赞高有祯认为此次北非局势动荡会使得地区格局进入动荡期，大国将调整对中东的政策，伊斯兰势力有上升的趋势，对地区与世界经济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研究员认为，当前非洲正在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变化的基本方向是正在向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靠拢；中国也在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与传统发展中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尽管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个趋势非常明显。这两种变化的交叉结果将会使中非关系出现新的变数，主要体现在：第一，意识形态方面。非洲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向是西方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给西方提供了干涉非洲事务的大量的杠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非洲的存在逐渐加大，对中国的政策早晚会成为非洲各国大选的议题。如此一来，就会使得中国和非洲国家间的关系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第二，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过去中国一直是非常大公无私的无偿援助建设者的形象。到目前为止非洲的主流对西方意见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带来了利益，但也已经出现了争论。

对于非洲出现关于中国负面形象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博士以中非能源合作中存在问题为例，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现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的矿产资源量是越来越大了，非洲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现在中国也大量进口非洲的自然资源，比如说中国严重依赖加蓬、南非、加纳等国的钴和锰，从南非、刚果、喀麦隆进口大量木材。非洲在保障中国资源消耗和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重要角色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的非议和指责。理由是：中国在非洲搞的是掠夺式开发，严重

破坏了当地环境；中国对非开发，阻碍了当地相关行业的发展；中国企业对当地工人待遇不公平。第二个是中国公司在非洲资源开发利用上面临的问题有：第一是开发时间落后于西方国家，导致我们的开发经验、技术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不占优势；第二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和模式的本土化程度比较低；第三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实际上不一定一致；第四是我们缺乏对非公共外交，造成话语权缺乏，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善行由于公共外交缺失和媒体话语权的缺乏，没能在国际舞台上广而告之，反而面临西方国家的一片指责之声。我们现在过多注重于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非洲的公共外交关注得特别少。

二 北非国家政治动荡的起因与性质

北非国家政治动荡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外交部亚非司参赞高有祯认为，西亚、北非动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民生问题恶化酿成局势的动荡，因为北非地区经济单一、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失业、城乡差异、国内社会矛盾，严重依赖外来的资源和市场，面对外界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弱，尤其是国际粮价的上涨给这些国家经济带来的压力。第二，当前的政治体制无法化解社会各种矛盾，非洲国家老人政治较为常见：思想保守、体系僵化、社会管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深化；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懦弱的体制导致各国民众起来反抗政府。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助长了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第四，现代传媒成为动荡的推手，手机、脸谱（FACEBOOK）、卫星电视等的开放，揭露国家领导人的丑闻等加剧了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民众也通过传媒散布消息，共同推动了局势的恶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研究员认为，中东地区的动荡蔓延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势头还会继续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地区处于西方列强的奴役和统治下，这个地区也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有三种思潮：第一种是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这是一个世俗思潮；第二个是泛阿拉伯主义，也是一个世俗思潮；第三个是宗教方面的思潮，就是原教旨主义。这三种思潮一直都在寻求一种改变地区命运的方式。但是，世俗力量严重受挫，原因主要有七个：第一，探索

救国的方式不对。世俗力量主要依靠军队，缺乏群众基础。第二，世俗力量在掌权后的腐败。第三，世俗力量构造的政治体系僵化。第四，盲目西化，伊朗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与伊斯兰教传统严重冲突。第五，中东地区宗教力量根深蒂固。第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相对廉洁。第七，作为外部因素的阿以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认为此次西亚、北非动乱是一次民主化运动，且在不同的地区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北非国家是由于民生问题引起的，但是这种由于民生的问题引起的动乱很快转变为对长期执政的个人专制政权的挑战。而巴林、利比亚等国家，它们的动乱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而引起的。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民主诉求，只能称之为运动，而非革命。理由如下：发生动乱的国家没有提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也看不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在很多国家，动乱是没有组织的，是自发的。没有领导阶级、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没有组织的动乱，不能称之为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李智彪研究员认为此次北非动乱实际上是非洲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马达加斯加在2008年底2009年初出现的政权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那种北非式的多发动荡模式，也是一个多发动荡的开始。只不过北非局势动荡加剧了非洲整体动荡的趋势，特别是西方军事力量介入以后，分裂的因素更多了，动荡表现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根据现状来判断，未来3—5年非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将会经历一个比较相对动荡的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跟北非一样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而且这个逢选必乱的情况最近比较多发。北非以外的非洲地区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暗藏了很多动荡的按钮。如索马里、科特迪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安哥拉等国，分裂势力也不断挑起事端，非统或非盟长期倡导的殖民地边境不可更改原则也面临着挑战。此次北非局势动荡让非洲一体化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从经济角度说，此次北非局势动荡有两大根源：第一是非洲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经过多少年的改革也没有多少的成效；第二是非洲的经济政策，从独立到现在，基本上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自主发展的能力非常弱。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博士认为北非局势动荡同颜色革命、苏联解体的过程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革命的宣传组织工具发生了彻底变革，也就是网络新媒体的作用。较之于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最大的特征

就是它的交互性。突尼斯爆发动荡之前，有两个点燃动荡的导火索都是经网络新媒体揭露出来的，一个是维基解密将政府腐败揭露出来了；第二个是突尼斯青年自身通过网络新媒体传播信息。当然，网络新媒体毕竟只是一种工具，最终根源还是亨廷顿的理由：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到政治，同时政治体制发展的步伐缓慢所造成的。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会日益销蚀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容易将民生问题所产生的社会矛盾转向新政治制度的诉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网络技术、网络新媒体不发达也是北非动荡不太可能在南部扩散的原因之一。

三 北非变局对地区和全球关系的影响

此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但对非洲地区本身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美国、欧洲各国纷纷卷入，尤其是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研究员就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会复制北非乱局作出阐释：引发北非局势动荡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在非洲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北非的动荡会不会扩展到撒哈拉以南，就可能性而言，这种担心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黑非洲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确实存在发生动荡的可能性，但是，黑非洲不会复制动乱。即便个别国家发生政局动荡，在性质上也会有别于北非国家，而且也不会像北非国家那样发生剧烈的政治动乱，原因在于黑非洲在整体上并不具备像北非那样的基础和条件。主要的理由如下：第一，黑非洲国家与北非的国家在国情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二，黑非洲相关国家已经针对这个北非动乱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第三，黑非洲与北非之间经贸联系和交往并不是很密切；第四，黑非洲文化不像阿拉伯文化那样具有渗透性。局势动荡之所以在阿拉伯国家迅速蔓延，除了政治经济结构外，民族结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刘海方副研究员认为现在南部非洲有类似于北非变动的情况。尤其是这几个国家：加蓬、喀麦隆、吉布提、布基纳法索，而且布基纳法索的事件跟突尼斯有着极其相近的形式。安哥拉在2002年战争结束后，直到2008年才有了第一次议会的选举，至于总统选举何时发生似乎永远都只

是在明年。这种情况是人们担心安哥拉国内社会稳定的重要理由。

北非局势动荡还处在进行时态，利比亚的局势涉及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志敏教授认为，英、法在这次利比亚战争中起了主导性的推动作用。如果来分析这里面的原因和动机，有几个方面值得考虑：第一是规范性的动机，即支持非洲国家的民主诉求。第二是人造的动机，卡扎菲政府要在反攻的时候说，“No Mercy”，被大家解读为他肯定要对人们赶尽杀绝，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判断。第三是所谓的国内政治的动机，特别是法国，萨科齐在其国内政治局势下当然希望法国在国际影响力上有所成就。第四是可操作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利比亚外交上比较孤立、军事力量虚弱。虽然英、法在这里面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但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战略分歧，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利比亚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尤其体现在德国对安理会的 1973 号协议选择弃权上，然后德国又决定不参与对利比亚多国联军的军事行动。从国际规范和价值的角度出发，此次利比亚战争确立了一个保护责任原则的先例。西方人认为其价值观已经在西亚、北非得到扩散，更加让他们有理由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欧洲有可能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确定对北非的一个不对称的优势定位，按照欧洲的意愿来变革北非社会与政治。欧洲看到有这样的机会便想利用此次机会，但能不能成功还要看未来的情势。从内部政治的角度来说，此次北非、西亚变局并没有给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带来政治好处；从军事战略的后果来说，欧洲有必要担心会陷入一个属于欧洲人的伊拉克式问题，因为欧洲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会想到 1994 年的卢旺达，或者说是科索沃，所以不可能冒风险。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不能很快解决的话，欧洲可能要陷入到自己挖掘的坑中。就欧盟的外交机制来说，这次利比亚的战争决策暴露出欧盟的新机制实质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无法显著地改变欧盟的国际军事战略协作的影响。从这次事件表现来看，欧盟既是一个民事力量也是一个军事力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刚教授认为，通过这次利比亚问题，地区新的力量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因为从利比亚问题的发生一直到最后采取的军事行动，阿盟的态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先提出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一定会这么顺利的通过。通过这次联合国的投票也可以看出国际格局的另一种变化，即新

兴国家的协调性是否在增强?因为这次投弃权票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集体弃权外,后面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外交协调。西方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时,其内部有很大的分歧和矛盾,尤其是表现在军事领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也要注意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的进程中的一些变化:首先的变化是后来西方的军事干预行动实际上是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的。虽然联合国授权范围说到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平民但后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都表示要把目标改成推翻卡扎菲政权,要把卡扎菲赶下台来结束军事行动。另外,利比亚反对派里的成分非常复杂,甚至怀疑与一些基地组织有联系,美国与欧盟对此也都非常担心,其中还担心恐怖分子混在难民当中进入欧洲。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李伟健研究员认为,此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应该就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阿盟在这次事件里显得非常无能为力,它没办法解决自己成员国的问题,最后只得去求助外援。也就是说,非洲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土耳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会下降。此次局势动荡也是一种转型,也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但旧的中东秩序被打破,新的中东秩序建立起来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任何政治的进展难以摆脱本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现实,所以它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影响。西方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或者阻止或者减缓世界政治权力向东方转移或者向世界其他国家转移,美国一直是采取政治现实主义,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中国的崛起,依然是美国当前一个主要的挑战。

北非局势动荡对本地区与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政治权力层面,对非洲和世界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尤其涉及非洲国家是否能克服自身的单一经济结构转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与国际油价的问题。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院舒运国教授认为,这次动荡主要表现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基础的脆弱性,单一性的经济结构造成非洲国家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依赖性,使单一经济的中东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依附状态。在这种结构下,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可以说直接制约着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也极其相似,单一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非洲经过此次局势动荡开始对自己原来的经济结构再次进行了反思。经济一体化、加强南南合作都是必要的路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张晓峰副研究员用量化指标分析了此次北非局势动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此次北非局势动荡会推动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对于中

国与北非国家来说,要实现积极稳妥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要推动双边贸易投资的发展,就要积极推进投资贸易风险评估和推进非洲国家政治建设。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这次所面临的风险,提醒了国家有关部委要加强对非洲政治风险的预警机制的完善。

四 中国处理非阿西关系的思想框架与话语建构

如何跳出就事论事,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此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尤其是回归到中国的立足点,从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来看待非洲发展的未来趋势,从更宽阔的视阈来看中非关系的前景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就中国处理非阿西关系的思想框架与话语建构,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度研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为什么要搞对外援助?第一是道义原则,也就是说人道主义的考虑;第二是价值的追求,包括稳定、发展、民主、自由、人权、环境等;第三是利益的角逐,利益的诉求包括对原材料的需要、对市场的需要、对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作用的需要。中国应认真总结过去这些年对外援助的经验,虽然提出了很多对外援助的原则,但有的原则可能已经过时了,比如说当年中国的专家和当地的人民要享受同样的待遇,像这种问题在新时期怎么处理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了。对外援助如何让受援国得益,就需要考虑到援助模式的调整,结合受援国国内经济、社会现实,例如受援国的就业情况。中国也要吸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目标既要利他也要利己,否则对外援助无法持续;要有规划,有规划才能使自己的对外援助,不要被特殊利益所绑架;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取决于我们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要依法进行对外援助;要制订系统的目标,定期对援助效果作出评估;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坚持以我对外援助目标为主要的国际合作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我们必要的独立性。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胡美博士认为,中国的援非实践体现了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观从政治领域到政治经济领域并重的演变,经历了单方面强调非洲的发展到中非双方共同发展这样的演变。中国对非援助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以共同发展为本质的全新的生存文化理念,让双方在援助合

作的方面共建互利共赢的格局。这个援助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利关系，在中非交往的中国援助 50 年中，中国是从一个援助者开始慢慢变成了一个合作对象。50 年的援非历程见证了和承载了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过程，50 年的南南合作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它的内涵正在不断的深化和丰富。中国的援非实践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开始是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无偿的双向的平等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向中国以合作者的身份与非洲国家围绕着互利双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转变，中国南南合作理念成长的过程就是中非双方不断的创造、保存和强化彼此对南南合作的理解过程，是中非双方的独特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南方国家确立正确国际观念、意识关系的重要贡献。

从此次北非局势动荡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审视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研究员认为，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是必须要关注内政。如果某个国家发生了变化，丢失的不仅是在国际投票上的一票，还有大量的投资；同时，还有这个国家如果有很多中国公民的话，把公民撤回来，后续问题可能会相当的多。但不干涉，又怎么关注呢？现实的策略就是要两面下注，一方面跟主权国打好交道，同时也要跟它的反对派建立好的关系。所以现在的外交不可能像过去，考虑到中国现实利益的存在与维持，中国外交的传统思维可能在非洲或其他地区要发生变化。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认为：不干涉原则不能动摇。但是，第一，不干涉内政原则束缚了中国的腿脚，不利于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海外权益的维护。第二，在中国海外利益和海外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重新反思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采取必要的行动对当地部门进行干涉，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第三，人道主义规范、人道主义灾难，这是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一个规范，包括中国可以慢慢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看待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理念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走和平发展，互利共生道路理念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所有的大国里面，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最坚定最充分坚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国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依靠，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对外关系一个构成性的、基础性的规范。如果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或是怀疑这个原则的话，会使中国承担更多的不必要的国际责

任。随着中国和世界相互关系的加深，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呼声在上升，那么中国确实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适度的法定责任，但是我们一定要谨记以所谓的国际责任为名采取貌似合法的具体方式，行干涉内政支持的任何行为。外交是国家的一个公权，公权的使用应该是很慎重的。如果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海外权益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都轻易地动用外交公权的做法，将是公权的一个浪费。关键的问题是在出现外部认为我们要干涉内政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处理，以及理论上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好让他国能够接受。西方从不干涉内政原则向新的国际化原则转变的时候，它提出了人道主义新规范。

此次北非局势动荡，也反映出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长期偏重西方大国的倾向，以及对非洲等地区的中小国家缺乏深入研究的现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认为，中国亟待加强对中小国家的国别研究。在北非局势动荡发生以前，大家都认为突尼斯是非洲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却最终发生了剧变？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态，比如说像卡塔尔和阿联酋这样的小国的行为方式，它们为什么区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卡塔尔为什么会出现半岛电视台？卡塔尔在近年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包括它协调黎巴嫩总统难产等等。我们对中东北非形势的这种惊愕，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长期对这些中小国家的研究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小国家研究的重要性；国家和社会都要加大投资，要有一定的眼光。

总之，本次研讨会从多维的角度对非洲发展趋势与中非关系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或从自己对非洲的实践经验，或从专业领域出发阐述了相关具体问题。研讨会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既有观点陈述也有观点交锋与辩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尤其是加强了直接从事对非工作的政府官员与从事非洲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国际关系区域问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存有空白点。但是，无论是政府机构直接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还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都不吝奉献自己的智慧与真知灼见，为此次研讨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周玉渊）